

《旧(新)唐书·文苑(艺)传》传主别集存佚简析

孟祥光

《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所收录的人物皆唐代知名“文士”，这些文士与同时代其他以文名于世且于《唐书》中有专传的人物不同，他们生前或“名位不振”，官爵不显，或虽荣官爵而功业不著。这些人在后世的接受境遇如何？对他们的文学评价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怎样的位移？本文拟选取这些唐代文人的别集作为考察对象，对该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时代境遇

唐代著名文人大都有别集。《旧唐书·文苑传》、《旧唐书·经籍志》或《新唐书·艺文志》因此也对这些唐人文集有专门的著录。

唐人修纂文集蔚然成风，数量空前增加，当时及其后的公私书目都多所著录，互为证补各有增删，不一而足。这为我们不断补录唐人别集提供了宝贵资料，却也使绝对精确的定量分析变得困难。为便于分析操作，本文将两《唐书·文苑(艺)传》中的“有集”者限定为：有别集载录于《旧唐书·文苑传》、《旧唐书·经籍志》或《新唐书·艺文志》者。之所以如此限定，是因为《新唐书·文艺传》中一般不再涉及传主是否有文集见存，而是统一载录到《新唐书·艺文志》中；《旧唐书·经籍志》则是基于毋熹之《古今书录》，故开元之下“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①。上述三者所录合在一起虽非当时唐人别集之全部，但也相对较为完备，尤其是《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人别集有505家，537部^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别集应该是修史者在当时特定条件下所能亲见或知晓的，并认为有载录下来以传晓后世的必要。它们已通过了史臣们作为官方代表所进行的搜集和遴选，对于反映这些文人在当时文学领域的地位或更具代表性。同样，为兼顾收录的范围与数据的有效性，我们将现有文集存世者限定为：见于万曼《唐集叙录》者或尹小林整理之《现存唐人著述书目》（电子文

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6页。

②鉴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此处所提及的别集不包括后人的补遗成果。

献),同时参考陈伯海、朱易安合著之《唐诗书录》^①,于是可得出两《唐书·文苑(艺)传》中的“有集”者别集存佚的基本状况:

根据统计可知,两《唐书》“文苑(艺)传”中所共收的“有集”者39人^②,现存集者17人,别集已佚者22人。两者所收有异者43人^③,现存集者16人,佚去27人。其中,仅收于《旧唐书·文苑传》之“有集”者20人,现存集者5人,佚者达15人。仅收于《新唐书·文艺传》之“有集”者23人,现存集者12人,佚者为11人。

合而观之,《旧唐书·文苑传》收录(包括附录者)的141人中,当时有文集存世者59人,存留至今者22人,别集已佚者37人。《新唐书·文艺传》所收(包括附录者)127人中,当时有文集存世者61人,存留至今者28人,别集已佚者33人。

从以上对于别集存佚状况的数量统计可知,大多数唐代“纯文人”的别集都没能逃脱湮灭的厄运,只有半数不到的文人依然能通过其别集的流传而为后世读者所认知。就总体而言,两《唐书》“文苑(艺)传”中所收之以文名世者,其文集在后世的境况大致相似。但也应该看到,两者在所收有异的43人中,人数差不多各占一半,但是收于《旧唐书·文苑传》者只有5人还有别集存世,而收于《新唐书·文艺传》者却有12人。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单就数量而言,似乎《新唐书·文艺传》中所收文人在后世的受认可程度要略胜一筹。

二、已佚别集之载录状况分析

以上两《唐书》“文苑(艺)传”中所收之以文名世者文集的存佚状况是否符合实际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已佚别集在后世目录典籍中的记录情况。虽然,有些目录类典籍确存在直接引录别书,著者实际未必亲见其书的现象。但这种情况并不多,特别对于我们这种旨在求其大势的统计来说,影响不大。通

①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尹小林《现存唐人著述书目》附于其研制的《国学宝典》,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公司,2003年5月;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年。

②这些“文人”中有别集存留至今者为:杜审言、杜甫、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李邕、孙逖、李白、王维、萧颖士、李华、孟浩然、王昌龄、李商隐等17人;别集已佚者有:袁朗、贺德仁、庾抱、蔡允恭、郑世翼、谢偃、张昌龄、杜易简、王助、刘允济、李适、宋令文、阎朝隐、富嘉谟、吴少微、谷倚、刘宪、王适、李翰、崔颢、薛逢、崔行功等22人。

③仅收于《旧唐书·文苑传》之“有集”者为:孔绍安、徐坚、邓玄挺、乔知之、乔备、刘希夷、员半千、丘悦、陈子昂、阎丘均、贾至、徐安贞、王浣、王仲舒、崔咸、唐彦谦、刘蕡、温庭筠、李巨川、司空图20人,其中仅陈子昂、徐安贞、唐彦谦、温庭筠、司空图等5人的别集存留至今,其余亡佚。仅收于《新唐书·文艺传》的23位“有集”者中,有别集存留至今的为:皇甫冉、皇甫曾、李观、李益、卢纶、韩翃、钱起、崔峒、欧阳詹、李贺、李频、吴融12人;已佚者为:苏源明、梁肃、刘太真、邵说、于邵、崔元翰、吉中孚、司空曙、耿湋、李端、吴武陵11人。

过别集在不同时代目录类著作中的著录情况，可大致推断出其在当时的存世状况。

如前所述，两《唐书》所收有异者 43 人，现存集者 16 人，佚去 27 人。其中，仅收于《旧唐书·文苑传》之“有集”者 20 人，现存集者 5 人，佚者达 15 人。此 15 人，除闻丘均、李巨川外，皆有集见载于南宋郑樵的《通志》^①。据此而论，其余 13 人于郑樵编撰《通志》之时应该尚有别集存世。此外，在《崇文总目》卷一二中载有“李巨川四六集三卷”但下注有“阙”字^②，故可推断李巨川的别集散佚当早于《崇文总目》修成之时即庆历元年（1041 年）。《刘希夷集》还见载于《说郛》卷十下^③，说明他可能有别集留存到了元末明初。《乔知之集》还见载于《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和《文献通考》卷二四二^④，其别集当能现于元代。《贾至集》还见载于《宋史》卷二〇八、《文献通考》卷二三一、《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和《说郛》卷十下^⑤，贾至的别集分别出现在这几处应该可以明确告诉我们其湮灭最早不会超过明初。刘蕡还在《崇文总目》卷一二和《玉海》卷六一中有集载录^⑥，也说明他的别集在南宋还可能存世。王仲舒则有《王仲舒制集》存于《宋史》卷二〇八^⑦。

可见，仅收于《旧唐书·文苑传》的这 15 人中，有别集存留至南宋的 14 人，至元代者 4 人，还有 2 人至元末明初。

再看仅收于《新唐书·文艺传》之“有集”者，23 人中现存集者 12 人，佚者为 11 人。其中，司空曙的别集仅见载于《崇文总目》卷一二。吴武陵的《吴武陵书》在《崇文总目》卷一二中注有“阙”字。其余 10 人皆有别集录于郑樵《通志》。《梁肃集》还分别见于《宋史》卷二〇八和《说郛》卷十下。《崔元翰集》和《邵说集》也见于《宋史》卷二〇八。《李端诗》还见于《崇文总目》卷一二和《宋史》卷二〇八。

可见，仅收于《新唐书·文艺传》之“有集”者，有别集存留至南宋的 10 人，至元代者 4 人，至元末明初者 1 人。

而两《唐书》所共收“有集”者 39 人，现存集者 17 人，别集已佚者 22 人。此 22 人，皆有集载于郑樵《通志》。另，崔颢有诗集载《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宋史》卷二〇八、《文献通考》卷二四二和《说郛》卷十下。《薛逢诗集》

①（宋）郑樵：《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

②《崇文总目》，中华书局，2006 年。

③（明）陶宗仪：《说郛》，中国书店，1986 年。

④（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6 年。

⑤（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⑥（宋）王应麟辑：《玉海》，广陵书社，2003 年。

⑦（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 年。

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和《说郛》卷十下。刘宪集和李适集也见《说郛》卷十下。

这说明,有 18 人的别集在南宋时尚存,而到了元代则只剩 4 人的别集。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两《唐书》中“文人”文集在后世的境况确有相似之处,有大半文人的别集湮灭于南宋至元这一历史时期。两者所收有异者如此,所收相同者尤甚。这或许与宋末兵火与元代的文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也许反映了其作者文学地位在不同时代的变化。

三、文学史载录状况分析

两《唐书》中当时以文名世的“有集”者们,其在今天的文学史接受视野中的境遇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两《唐书》文人传同收之“有集”者的情况。

有别集存留至今的有:杜审言、杜甫、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李邕、孙逖、李白、王维、萧颖士、李华、李商隐、王昌龄、孟浩然。根据他们在各本文学史中的出现情况可知^①,上述这些为两《唐书》编著者所共同认可的文人,同样受到当今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们有别集传世,还可能不止一个版本系统。对其作品和创作的关注,使得他们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当今的文学研究领域。虽然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地位难免会有此消彼长,但总体而言他们在历代受众的文人观中已经达成了共识。

别集已佚的有:薛逢、袁朗、贺德仁、庾抱、蔡允恭、郑世翼、谢偃、张昌龄、杜易简、王助、刘允济、李适、宋令文、阎朝隐、富嘉谟、吴少微、谷倚、刘宪、王适、李翰、崔颢、崔行功。根据他们的出现频率可知^②,除李翰、崔颢等极个别外,这部分“文人”在当今的文学史领域几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这些别集未能流传至今的文人,虽然其因两《唐书》编著者的共同认可而得以入选各自的“文人”传记,但其作品在后人的接受视野中就不再那么重要了,渐渐淡出了后人的视线。

①为便于行文,各注释中都将其出现频率统一表述为:姓名(游本出现频率袁本出现频率章本出现频率)。杜审言(1/2/2)、杜甫(40/36/27)、卢照邻(1/3/2)、杨炯(2/2/2)、王勃(2/4/4)、骆宾王(1/2/2)、沈佺期(23/1)、宋之问(2/2/1)、李邕(1/2/1)、孙逖(0/0/0)、李白(31/33/24)、王维(17/11/11)、萧颖士(3/2/1)、李华(2/2/1)、李商隐(8/20/13)、王昌龄(6/4/3)、孟浩然(8/7/3)。

②薛逢(0/0/1)、袁朗(0/0/0)、贺德仁(0/0/0)、庾抱(0/0/0)、蔡允恭(0/0/0)、郑世翼(0/0/0)、谢偃(0/0/0)、张昌龄(0/0/0)、杜易简(0/0/0)、王助(0/0/0)、刘允济(0/0/0)、李适(0/0/0)、宋令文(0/0/0)、阎朝隐(0/0/0)、富嘉谟(0/0/0)、吴少微(0/0/0)、谷倚(0/0/0)、刘宪(0/0/0)、王适(1/1/0)、李翰(1/2/1)、崔颢(1/3/2)、崔行功(0/0/0)。

上述两个文人群落因同时入选两《唐书》的“文人”传,而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两部《唐书》文学意识共同性的具体表现。所不同的是,后一群落因别集的湮灭,而成为了后世文学意识流变的标的物。

下面再考察两者所收有异者:

仅收于《旧唐书·文苑传》且现存有别集的是:陈子昂、徐安贞、唐彦谦、温庭筠、司空图。陈子昂、温庭筠与司空图无论在古典文学还是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都占居重要地位,这也反映为他们在各本文学史中出现的频率^①。唐彦谦也经常会在散文研究者的视野中出现,只有徐安贞可谓是一个特例。这一类文人虽然数量少,但影响却非常大,显示出了《旧唐书》的编撰者独到的眼光。

仅收于《旧唐书·文苑传》而别集已佚者有:孔绍安、徐坚、邓玄挺、乔知之、乔备、刘希夷、员半千、丘悦、闾丘均、贾至、王浣、王仲舒、崔咸、刘蕡、李巨川。这一类文人,数量虽多,但除刘希夷、贾至等少数几个人外,其他各位都随其别集的散佚而几乎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②,与其在当时的显赫声名迥异。

仅收于《新唐书·文艺传》且现存有别集的是:皇甫冉、皇甫曾、韩翃、钱起、崔峒、李贺、李益、李观、卢纶、欧阳詹、李频、吴融。无论是李贺、韩翃、李益等有唐一代的文学大家,还是其他声名稍逊的文学家都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刚好证明了编修《新唐书》的史臣们是只眼独具,选录水平可能在《旧唐书》编者之上。

仅收于《新唐书·文艺传》之别集已佚者为:苏源明、梁肃、刘太真、邵说、于邵、崔元翰、吉中孚、司空曙、耿漳、李端、吴武陵。这部分文人与仅收于《新唐书·文艺传》之现存有集者有相同之处,有很多是某一个文学群体的重要成员,因此,即使别集散佚,他也能凭借其文学群体之势在当今的文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③。但大势已定,这些别集散佚者很难成为文学史评价体系中的独立一环,他们在各本文学史中出现的频率正说明其作为有唐一代“文人”代表身份的丧失。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①陈子昂(13/8/7)、徐安贞(0/0/0)、唐彦谦(0/2/1)、温庭筠(4/11/6)、司空图(4/3/4)。

②孔绍安(0/0/0)、徐坚(0/0/0)、邓玄挺(0/0/0)、乔知之(0/1/0)、乔备(0/0/0)、刘希夷(1/1/2)、员半千(0/0/0)、丘悦(0/0/0)、闾丘均(0/0/0)、贾至(0/1/1)、王浣(0/0/0)、王仲舒(0/0/0)、崔咸(0/0/0)、刘蕡(0/2/1)、李巨川(0/0/0)。

③苏源明(1/0/0)、梁肃(2/3/1)、刘太真(0/0/0)、邵说(0/0/0)、于邵(0/0/0)、崔元翰(0/1/0)、吉中孚(1/1/1)、司空曙(1/1/1)、耿漳(0/1/1)、李端(2/2/1)、吴武陵(1/1/1)。